

DOI : 10.6256/FWGS.201904_(110).11

從女性勞動參與的模式勾勒父權： 瀨地山角（Kaku Sechiyama）教授 演講紀實

文 | 鄭珮宸 |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

圖 | 國立臺灣大學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提供

聖誕佳節是許多人與家人相聚的日子；但若要深入理解「家」這個時而充滿理想、時而令人厭煩的概念，我們也總得拆解家庭的運作，或者，在某些層次上，檢視家庭性別分工的難題。

國立臺灣大學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、國立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，合作於 2018 年的聖誕節，邀請專司社會性別論及東亞問題的瀨地山角（Kaku Sechiyama）教授，分享他於 1996 年出版，並於 2013 年譯為英文版的研究：《東亞的父權——社會性別之比較社會學》（*Patriarchy in East Asia: A comparative sociology of gender*）。教授主要分享研究中有關國際比較的數據，尤其聚焦於細緻化女性的勞動模式，並透過呈現資料細節，指向東亞的父權體制如何運作與影響女性的生活。

瀨地教授嘗試勾勒東亞國家女性的勞動模式，並透過國家之間的比較，

呈現日本、臺灣、中國、南韓（和資料上的北韓）等國的差異。教授開門見山地指出，研究對現象的詮釋將著重在文化面向的影響；不過筆者認為最有趣的，莫過於座談會後台下師生與瀨地教

瀨地山角教授



主 講 | 瀨地山角 (Kaku Sechiyama) | 東京大學研究所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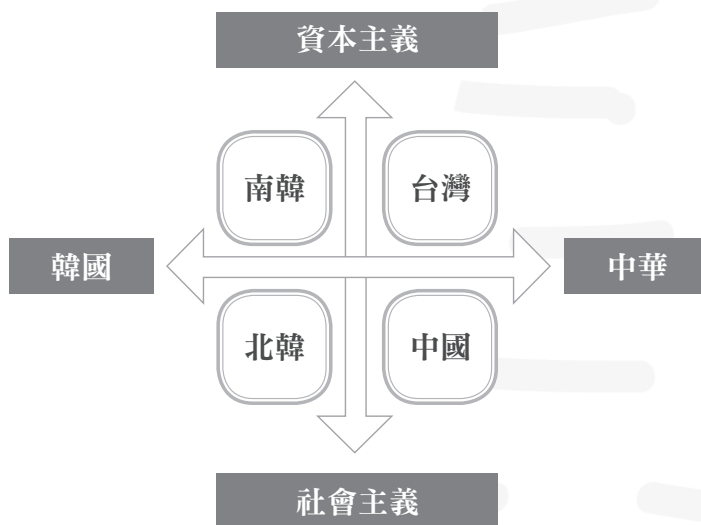
主 持 | 葉德蘭 |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、國立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召集人

主辦單位 | 國立臺灣大學亞洲社會比較研究中心、國立臺灣大學婦女研究室

時 間 | 2018 年 12 月 25 日 12:30~14:00

地 點 |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社工系館 319 室

圖一：瀨地教授的文化分析框架（引自教授演講投影片）



授的答辯與互動。本文將簡略呈現瀨地教授的分析框架、提到的現象以及詮釋、記錄與會者的交流，最後以筆者的淺薄心得暫作結語。

首先，瀨地教授勾勒出幾個國家的文化傾向。他指出，東亞社會看似受到儒家文化影響，實際上在不同國家，基於歷史上社會體制（社會或資本主義）

發展的差異，以及國家的文化傾向，呈現相異的文化意識形態，進而展現為不同的女性勞動力參與模式型態（圖一指出這些國家的差異）。教授也引入了自己對父權體制的觀點：父權體制具現在家戶中的性別分工上，是由男性承擔生產、女性承擔再生產責任的分工狀況。

介紹完文化背景與研究關懷，演



主持人葉德蘭教授手持瀨地山角教授所著
Patriarchy in East Asia

講便沿著已婚女性的生命週期展開：從婚姻、生子到年老，日臺韓中的女性呈現不同的生命軌跡。透過跨國比較可以發現，看似相近的東亞各國之間，有許多細緻的軌跡差異。例如，許多臺灣女性會在三十到四十歲照顧兒童的時期，將孩子送給鄉下祖父母照顧；相對之下日本幾乎不會發生。教授指出文化在其中的作用：在日本，社會期待母親照顧兒童，祖父母幾乎不會插手。又或者韓國母親傾向待在家中陪伴兒童直到孩子上大學，且相對於日本，韓國媽媽會跟著孩子去海外學習；而日本則認為這是孩子應自己面對的。作者也透過量化資料為一些迷思「消毒」，例如有許多人認為日本媽媽傾向陪伴小孩直到三歲，這點並未在資料中被支持。

但是女性的教育背景是否影響到生命軌跡的選擇？瀨地教授認為高等教育程度的女性的確更願意考慮工作，但

這在臺灣社會比較明顯，對南韓幾乎沒有帶來太多影響。若比較薪資，女性的教育程度在剛出社會時會為薪資加分；但四十歲以後整體上沒有差異。最後從整體圖像來說，日本的M型化圖像反映了女性在兒童上小學後即開始尋職；南韓女性在離開勞動市場後，較少重返職場；而臺灣更傾向在婚後或生子後維持工作狀態。

不同於經歷高度資本主義化與經濟起飛的南韓、臺灣與日本，瀨地教授也納入了北韓與中國的女性勞動力想像。由於北韓的資料取得困難，教授以文化意識形態作為比較基礎。同為社會主義的國家，北韓積極強調賢妻良母的角色，但是在中國則強調勞動力，鼓勵女性工作，再由國家處理托育的問題。雖然同樣處於儒家文化以及社會主義的結構影響，中國與北韓卻發展出不同的女性勞動力想像；教授指出，這樣的想像差異可能牽涉到兩國統治正當性的來源差異，例如相對於由共產黨統籌決策的中國，由金氏家族統治的北韓必須維繫國民順服於一姓之家，所以刻意強化文化中的家庭想像；這些意識形態影響女性生涯，更體現出父權體制對女性選擇的壓迫。

隨著照顧工作告一段落，這群已婚女性也邁入銀髮生活。瀨地教授指出日本接近於美國、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，有較高比例的女性高齡工作者；並且工作的主要動機是非經濟的，包括好玩、交朋友等。其中日本女性又以「對健康有益」為主要信念，認為工作時程有助維持規律的生活。但是在臺灣，幾乎沒有人認為工作有助健康，並且超過八成的工作者是出於經濟動機。教授指出，相對於日本社會中鼓勵長者工作，中華

文化薰陶下的中國與臺灣則勾勒出含飴弄孫的家庭美景，長者工作被視為孩子不肖或無能。不過，教授也未忽略居住形式改變，可能帶來理想與現實的落差。他指出，許多年老的從農者（尤其韓國），雖然在文化意識上期待擺脫勞動壓力，但肇因於都市化的力量，子女搬離農田，使勞動力無法移轉，因此仍須維持勞動狀態。

結言之，東亞各國雖然在歷史上



都受到儒家文化影響，並且同樣將父權體制體現在性別分工上，但是各國的性別勞動模式仍有差異。瀨地教授認為差異部分來自於國家如何引介傳統文化、如何形塑家庭與妻母的形象；對女性的期待則影響了女性如何實踐其有酬勞動參與。

在提問交流時，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蘇國賢教授挑戰瀨地教授的文化詮釋，指出以臺灣為例，因為低薪的經濟結構，造成夫妻雙方同時工作才可能維持家計；同時臺灣少為年長者規劃的工作職位。雙面合謀下，祖父母照顧孩子，一方面是夫妻需要托育、另一方面也是長者少有其他就業機會。瀨地教授則認為，即使經濟結構形塑出將幼兒托給祖父母的環境，但是也需要行動者視之為合理安排才可能發生。在日本，祖父母不會為了幫忙帶小孩而辭職，因為照顧孫子不在他們考量是否持續工作的範圍；而女性也不會將祖父母視作托育的幫手。

藍佩嘉和吳嘉苓教授則注意到文化本身的變化。她們都指出文化自己也在轉變，例如「主婦化」的現象在日本也是戰後才逐漸出現，因此或許未來研究也可以討論：為何日本得以發生明顯的主婦化，但臺灣卻相對不明顯？也從工作文化挑戰以家庭意識形態解釋的正當性，例如日本年老女性雖然強調工

作有益健康，但是日本也同時是工作過勞大國。文化理解與現象訊息的落差要如何處理，是另一個問題。瀨地教授則有不同意見，他指出文化意識形態的變化是緩慢的，以日本為例，從 1920 年代以降就出現主婦化的現象，1975 年女性勞動力才掉入谷底。以運作邏輯而言，依然是以性別分工維繫父權體制。這些文化元素成為背景，埋藏在行動者內心，也將影響行動者的作為。

蘇國賢教授發問一景



吳嘉苓教授也指出研究的另類切入點，認為除了「家庭」或「女性角色」，未來可以從「老年」的文化定義來討論。例如不同國家對長者的不同想像與期待，是否影響到銀髮友善的就業環境？又或者政府的年齡劃分方式，如何影響到就業市場的運作？尤美女立委延續並追問兩個問題：一是日本的銀髮政策在鼓勵年長女性的就業上，提供怎樣的協助？二是年長者重回職場，是

否對青年就業帶來壓力，或如何影響年輕人看待長者就業的情況？瀨地教授則分享了日本各地的銀髮求職中心，媒合年長女性從事家務清潔、準備飯食的到府服務，以實際案例表達他對不同可能性的樂觀。

另外藍佩嘉教授也提出對臺灣高齡女性勞動參與的有趣觀察。不同社會地位與積極的高齡女性，會進入不同的勞動市場：低社經地位者或許會流入清潔等低收入部門，但高社經地位、尤其是軍公教的退休者，經常投入志願工作。瀨地教授也分享到，日本投入志願工作的年長女性也非常多；但兩國最大的差異，是日本退休老人會找去工作；而臺灣則理所當然地認為，退休是脫離勞動市場的同義詞。

最後也有與會者質疑，為何選擇以社會主義／資本主義和中華／韓國文化兩個向度，來拆解父權體制？對此瀨地教授則簡單回應，希望透過研究展示東亞並非鐵板一塊，以跨國比較的方式呈現出同樣的儒家文化、東亞地域條件下，文化仍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人們的日常性別分工，繼而維繫著父權體制。

於我而言，演講的精彩集中在瀨地教授與老師們的交鋒。其中有一幕令我印象深刻：尤美女立委詢問日本政府如何處理媒合長者打掃





工作的安全問題，瀨地教授疑惑地問道：「打掃哪有安全問題？」藍佩嘉教授則笑著說，這就是臺灣與日本的差異。

對文化想像差異的討論，讓我聯想到另一個子題。瀨地教授提到，相對於伴子出國求學的韓國媽媽，日本家長更傾向認為海外求學是孩子的選擇，也是孩子應自己承擔的歷練。換言之，除了「家庭」、「性別角色」以及「長者」的文化想像，或許對「兒童」的文化想像也應被納入討論，才能完整勾勒家庭選擇的產生。

或許社會對兒童的想像，也影響到為母者所需承擔的照顧責任。例如臺灣從 2015 年以來對公園兒童遊戲場的安全檢驗，以及從 90 年代起兒童遊戲場受傷的報導立場，反映出臺灣群眾對於兒童安全的緊縮想像；與此同時，部分反對者認為遊戲場應該讓兒童冒險，而受傷的風險則在照顧者身上，由照顧者全程專心地陪伴兒童遊戲。照顧壓力的膨脹，也意味著兼顧勞動與家庭的困難提高了；而照顧者通常是母親／女性。

從這個想法切入，我認為瀨地教

授的文化詮釋或許也為我們打開行動的窗口。首先，瀨地教授提醒我們，文化中家庭、性別的意識形態會緊密影響到女性勞動參與的軌跡；行動的切入點，就是對女性勞動參與軌跡的另類想像。作為身處臺灣的女性，我們如何投射自己的未來生命？在勾勒的過程中，又有哪些文化概念的資源

支持我們的想像呢？再者，透過臺日經驗的比較與交流分享，我們看見兒童與老人的文化概念本身也發揮了影響；因此，與其聚焦在家庭性別分工，我們或許可以回到勞動與年齡的互動項，檢驗這個社會對於勞動生產者／再生產者的對立想像，如何圍繞著接受照顧者的意識形態所影響。

